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THOMAS HARDY

哈代研究文集

Thomas Hardy: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聂珍钊 马弦 编选



 译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哈代研究文集

Thomas Hardy: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聂珍钊 马弦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代研究文集 / 聂珍钊, 马弦编选.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9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4315-0

I. ①哈… II. ①聂… ②马… III. ①哈代, T. (1840~
1928)—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561.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1192 号



书

编选者 聂珍钊 马弦

责任编辑 金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4

字 数 271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315-0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识、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

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国外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

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

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编者序

这是一本哈代研究的学术论文译文集,编选者在遴选和编排这部文集的来源文本时,考虑并兼顾了以下几个因素:一、研究时间的延续性。文集所选编的哈代研究论文,有上个世纪70年代的研究成果,如《论卡斯特桥市长的软化》、《哈代和他的读者》等,也有21世纪以来的最新哈代研究成果,如《托马斯·哈代之“灵与肉”》、《新的视角:哈代作品中的光与亮》等等。借助这些论文,读者能够捕捉和把握近四十年来国外哈代研究的走向和脉络。二、研究内容的广泛性。所选的研究论文,既涉及哈代的时代背景、创作过程、创作思想的评述,也兼顾对他的创作风格和叙事艺术的研究,内容上不仅关注哈代重要长篇小说的研究,同时也兼顾哈代的诗歌及长篇叙事史诗《列王》的研究。三、研究视角的新颖性。哈代研究在哈代在世时候已经开始,一直是西方文学批评的热门和焦点,研究论文不计其数。这本译文集所选的哈代研究论文,旨在向读者推介哈代研究的新近成果,关注哈代批评的新视角和新语境,如《视觉的瞬间:〈德伯家的苔丝〉的后现代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叙事艺术:诗歌和短篇小说》等。四、论文作者的权威性。本书所选编的论文大多出自哈代研究名家,如米歇尔·米尔盖特、诺曼·佩吉、菲利普·马莱、詹姆斯·吉本森、F.B.皮尼恩、玛丽·芮默等,他们都是哈代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最初在对这个译文集设计时,编选者的目标就立足于建立起一个服务于哈代文学作品爱好者以及大专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研究资料库,为今后哈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搭建新的参考平台。当然,尽管编选者竭尽全力,在重点选取哈代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争取研究内容的丰富性,但由于译文集的篇幅所限,加上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例如哈代著名专家克瑞斯汀·布兰迪的论文《托马斯·哈代与性别问题》,由于版权等问题,

只能忍痛割爱)。因此,编选者常常顾此失彼,在内容的编排上和研究者的取舍上,无法做到周全,在此恳请读者谅解。由于译者理论水平和翻译水平有限,翻译中也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也在此敬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编选者序1

第一辑 作家与创作

托马斯·哈代:传记资料3

米歇尔·米尔盖特

哈代,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及地方色彩21

玛丽·芮默

感知万物:哈代与“自然”的本质41

菲利普·马莱

托马斯·哈代之“灵与肉”58

特里·伊格尔顿

哈代和他的读者69

詹姆斯·吉本森

哈代与科学:偶然篇95

安琪莉可·理查森

第二辑 艺术

艺术与美学思想121

诺曼·佩吉

新的视角:哈代作品中的光与亮137

迈克尔·欧文

托马斯·哈代的叙事艺术:诗歌和短篇小说154

道格拉斯·邓恩

第三辑 重要小说及《列王》

《绿荫下》、《远离尘嚣》与《林地居民》中的宗法制175

彭尼·博梅哈

论卡斯特桥市长的软化191

伊莱恩·舒瓦尔特

《还乡》:人物性格与自然环境208

西蒙·加特莱尔

《列王》中的主人公215

F.B. 皮尼恩

视觉的瞬间:《德伯家的苔丝》的后现代解读225

彼得·威多森

《无名的裘德》:悲观主义和小说的形式243

戴维·洛奇

第四辑 诗歌

现代英国诗歌中的哈代传统255

塞缪尔·黑尼斯

伟大诗歌的特征——特殊事物普遍特征的完美体现:托马斯·哈代273

詹姆斯·吉本森

第一辑

作家与创作



托马斯·哈代:传记资料

作者 [英国] 米歇尔·米尔盖特

译者 王卓

尽管——很明显——哈代是一位 19 世纪小说家和 20 世纪诗人,但是他的诞辰距今已将近一百六十年之遥,而他辞世之日距今也有七十年之久了。他的有生之年取得的巨大声誉唤起了人们对他个人生活的好奇,而他则不遗余力地拼命抵制。他身后声名依旧,流行程度甚至与日俱增,这自然吸引了传记作家们的关注。然而,众所周知,哈代死后仍睁着一只眼睛关注着他的隐私,他销毁了自己大部分私人文献,亲自撰写了他本人的官方“生活”并于身后发表,并由他的文学遗嘱执行人签字画押(尽管他们在别的事情上常常意见相左)。

在这样的情形下,加之年代久远,与传记叙事的先入为主保持点距离,同时尝试对目前对于哈代生活和事业研究可参考的文献进行梳理,似乎更为明智。尤其重要的是那些已被印刷或者制作成微缩胶片的文献资料(笔记、信件、手稿),它们普及面广,使得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读者能够直接走近哈代,并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尽管不一定对前者一无所知——已出版的传记的“私人”关系。那样的第一手经历可以由他们自己不断丰富,并由此成为其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它们也可以作为估计不同传记作者的语气、脾气秉性以及诠释偏好的标准。它们不但可以用来质疑作者们证据的充分和精确与否,还可以质疑证据的来源是否独到。至少它们也能强化哈代现在或者曾经是一位多么“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意识。

有必要对哈代本人阴魂不散的官方传记画上个句号了。1917 年